

· 国际经济 ·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

——以浙江省为例

夏杰长 王曰影 李銮溟

摘要：服务贸易是对外开放的主要领域和关键抓手，浙江省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制度型开放的前沿阵地和重要窗口，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提供省域案例和参考标准。本文在明确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的三个维度的基础上，深刻挖掘服务贸易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以高质量发展规避服务贸易加深收入分配不均和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全面发挥服务贸易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成长优化、创新驱动、人力资本等三类效应。目前，浙江服务贸易发展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也面临着诸多赋能困境和现实挑战。本文基于赋能机制和现实挑战的全面分析，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赋能机制的实施路径：坚持服务业转型升级，优化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生态圈；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精准定位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路径；继续增强数字化转型赋智赋能，加快推动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强化服务贸易赋能共同富裕理论研究，动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和政策落实。

关键词：服务贸易 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王曰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銮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平台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依托创办经济特区，实施沿海开放城市战略，以及建设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推动中华民族真正“富起来”和“强起来”。但是，特定阶段采取的、存在明显地域性差异的开放发展定位，在加快我国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并且不断加剧。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对外开放应当如何赋能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刻挖掘国内国际两个市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生产网络视角下服务业技术进步影响因素、机制及路径优化研究”（72073139）、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研究”（2022CJYB00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创计划”科学研究项目“货币锚视角下货币国际影响力演变及影响因素”（2023-KY-1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李銮溟为通讯作者。

场、两种资源的深厚潜能，有效破解区域、城乡间发展不均衡的困境，切实发挥好对外贸易“先富带动后富”的拉动效应，形成我国新时期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全新动能呢？

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服务化的时代背景下，服务业开放是我国新发展阶段向制度型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转变的关键抓手和重要突破口，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赋能推进全社会共同富裕的核心环节和重点领域。目前，有三个主要问题亟待研究探讨和深入分析：一是“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和核心本质是什么？二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夯实强化“共同富裕”物质基础和财富源泉，赋能“蛋糕”“做大做强”？三是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效益成果如何广泛、合理、平等惠及全体人民群众，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双维度领域中实现“分好蛋糕”的目标？

2021 年 5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要求推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打造富有省域特色和示范作用的实践案例。^① 浙江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更是服务业对外开放领域创新引领、开拓突破的领头羊和试验田。2015 年 9 月，浙江省商务厅发布《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基地创建办法》，旨在深度释放服务贸易发展基地推进产业集聚、提升产业规模、加快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先导作用。2020 年 8 月，商务部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将浙江省杭州市作为全国范围内 28 个省市（区域）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之一，赋予杭州市探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发展高地的重大使命。^② 2021 年 5 月，《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以打造全国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为重要契机，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推动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③ 综上所述，浙江省具备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及考察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意义的社会环境和政策保障，可以为我国如何依托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共同富裕社会建设提供省域样本和典范成果。

本文将明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的三个重要维度，阐述分析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作用机制和影响逻辑，归纳总结浙江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主要特征和现实挑战。在深刻研究浙江省实践样本和现实案例的基础上，从“做大做强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个方面。深入探讨强化服务贸易对共同富裕发展建设正向赋能效应的实施路径。

一、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单纯追求数量和规模的对外贸易发展观念已经无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实施传统的对外开放模式也无法适应我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作为对外开放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是否能够发挥对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促进效应，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的服务贸易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发展来强化这种促进效应，这是我国学术界关注和探讨的热点议题和研究前沿。目前，针对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对我国共同富裕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1 年 6 月 10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6/10/content_5616833.htm。

②商务部：《关于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商务部官网，2020 年 9 月 27 日，<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g/202009/20200903004693.html>。

③浙江省商务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浙江省商务厅官网，2021 年 6 月 4 日，http://zcom.zj.gov.cn/art/2021/6/4/art_1229267969_4652376.html。

社会建设的影响效应，以往研究文献中主要包括两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速扩大地区、城乡和行业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戴枫和孙文远（2012）认为，服务业开放的工资提升效应存在技能异质性，可能导致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扩大，尤其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摆脱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困境。马颖和余官胜（2010）、邵建春（2012）等学者则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境、自然禀赋分配等方面差异，会形成区域间、行业间服务业对外开放和贸易发达程度的先天性失衡，进一步演化为地区间贸易壁垒强化、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包容性发展的现实挑战。

第二类观点是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提升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双维度的“共同富裕”水平。姚战琪（2022）指出，服务贸易促进国内企业创新效率的快速提升，推动中高端消费品进口扩张，有利于丰富国内消费者需求清单，实现人均消费支出和增进消费者福利的有效提升。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促进效应，还体现在产业升级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上。夏杰长和李鑫溟（2022）提出，要发挥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的产业升级效应，不仅推进服务业的创新变革和转型升级，而且促进服务业同第一、二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三次产业的柔性化和个性化生产，实现国内供给侧效率的优化提高，有效满足国内居民日益多元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徐紫嫣和夏杰长（2022）认为，服务业开放的技术溢出效应，有效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商业模式，创造相对省时、省力的学习模仿机会，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加快优化相关产业间的要素配置，有利于推动国民收入水平的全面提升。

目前，大部分文献聚焦在传统的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模式对共同富裕建设的机制探讨及实证分析，如何有效发挥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积极效应，同时通过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有效缓解和阻断其加深国内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研究领域亟需深入探索的重大议题。

（一）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

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焦点和关注重点，学术界对其界定和认识已经形成部分基本共识：一是“创新”“改革”“开放”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三轮”驱动力。“科技”“制度”“模式和业态”领域优化升级、变革转型的“创新轮”，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发展建设的“改革轮”，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制度型对外开放局面的“开放轮”，形成融合协调、共同发力、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驱动引擎。二是高水平的“发展任务”和“目标导向”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引。“系统性”“全面性”“可持续性”“民生指向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向，国民经济领域的“总量提高”“效益提升”“结构优化”“安全高效”“发展可持续性”“成果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和重要目标。三是“科学理论”和“顶层设计”的高质量协同优化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合力。深刻认识和解决回应“中国问题”，需要“中国学术”引领的“中国道路”来实现。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则必须同顶层制度设计匹配运行、动态优化。坚持立足大局、抓住根本，以理论创新和研究应用辅助顶层制度的合理规划，以政策法规的精准实施和动态优化验证发展分析框架及理论内容，两者的共振协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合力。

以此类推，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维度包括：一是深层释放和充分发挥“创新”“改革”“开放”三轮驱动力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二是明确规划服务贸易领域“贸易规模稳步提高”“贸易效益持续提升”“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对外开放兼顾国家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开

放合作和经贸成果全球共享”等高水平的发展任务和核心目标；三是形成服务经济领域的中国理论体系，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服务贸易的科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广度及精度，助力服务贸易领域相关政策的精准制定和贯彻落实，形成新发展阶段我国智库支撑和顶层制度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合力。

（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建设：影响逻辑和作用机制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释放促进共同富裕建设的赋能效应，其影响效应的底层逻辑就是“尽其所长，强其所短”。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挖掘放大服务贸易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和加速效应；二是通过深化推进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阻断服务贸易扩大地区或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确保服务业开放合作的丰硕成果能够由广大人民群众更平等、合理和广泛地享有。

1. 尽其所长：强化服务贸易推动共同富裕建设的积极效应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将进一步强化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积极效应。一是放大服务贸易的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攀升效应。通过推动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释放服务业活力，扩大服务业开放，可以加速服务业和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高“中国服务”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二是增强服务贸易打破区域贸易和引资壁垒的作用。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必然会强化破除贸易和外资壁垒的重要效应，服务贸易发展需要深化服务贸易改革开放，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打造高水平改革开放平台。这有利于降低服务贸易的政策和制度性壁垒，增加服务贸易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促进国际规则的协调和一致，从而创造服务业领域开放包容、互利互惠、平等安全的国际合作环境，促进区域间和全球范围内要素的合理、高效流动及配置，进一步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三是保持服务贸易激发市场活力、满足和释放消费需求的强大功能。服务产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旅游、电信、教育、医疗等服务更是在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和满足感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通过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推动服务产品更大规模、更高品质、更优定位、更多元化的市场供给，更充分地满足广大居民日益丰富和发展的服务消费意愿，进一步释放其服务消费潜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动力。

2. 强其所短：阻断服务贸易加剧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

通过服务贸易的转型升级，有效规避及阻断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扩大居民收入差距，加速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形成共同富裕成果分享鸿沟等负面影响效应，更充分地赋能共同富裕的建设实践。一是弱化服务贸易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负面效应。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旨在突破原有的部分地区“先行先试”的开放制度模式、市场准入限制和隐性壁垒，强调服务贸易目标上的系统性、全面性、可持续性和民生指向性，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发展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服务贸易，改变国内各区域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不均衡局面，打造适宜本地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建设的服务业开放与贸易环境。二是调整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行业结构和服务业开放结构。长期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两极化特征仍然显著，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规模虽然呈现快速提升趋势，但较发达国家仍存在质和量上的巨大差距。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依托创新、改革、开放的高质量“三轮”驱动力，将在保持劳动力和资本密集的服务贸易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优化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以及行业结构，继续强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传统领域服务贸易优势稳固”^①行业结构持

^①此处指的是运输、工程建设等传统优势服务贸易保持稳步增长，金融、文化娱乐、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以及其他商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快速增高。

续优化的基本态势，从而提高我国在全球市场份额以及服务贸易出口综合竞争力，助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共同富裕社会。根据上述机理的底层逻辑阐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建设的赋能机制可归纳为如下三类效应：

第一，增长优化效应，其表现为服务贸易提升服务业及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形成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和高速度增长的产业生态圈，赋能高效率和质量经济增长。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是“富裕”，经济高质量和高速度增长是实现更广阔、更深刻“富裕”的现实基础。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增长优化效应具体表现为：一是通过服务业高质量开放和先进技术引入，加快服务业及上下游产业向“低碳”“绿色”“高效”转型，实现产业链条和产业生态圈的优化升级，形成经济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的生产原动力；二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满足和激发的居民消费意愿及市场需求，在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日益丰富和不断提升的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同时，也为建设共同富裕社会注入增强市场活力和优化生产供给的需求动能，筑造需求和供给两端平衡互配、协调互促的循环链条。

第二，创新驱动效应，其体现为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普及运用和广泛渗透，形成跨境电子商务、云展会、数字服务贸易等外贸新形态、新业态和新模式。“高质量发展”所突出的“创新”驱动力，与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包括要素禀赋中的创新导向、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以及消费贡献在增长动力中的日益重要性等新阶段的目标定位相互协调、紧密关联。一是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通过服务业和数字技术融合的创新途径，有效打破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创造新的增长契机和居民收入增长的新突破口，从根源上打破资源分布不平衡，限制实现共同富裕的困境。二是数字化转型下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服务业开放，加速服务贸易供需两侧的相互匹配和转型升级，通过降低服务贸易的传统成本来扩大贸易效益空间，催生出更多服务业领域新业态、产品和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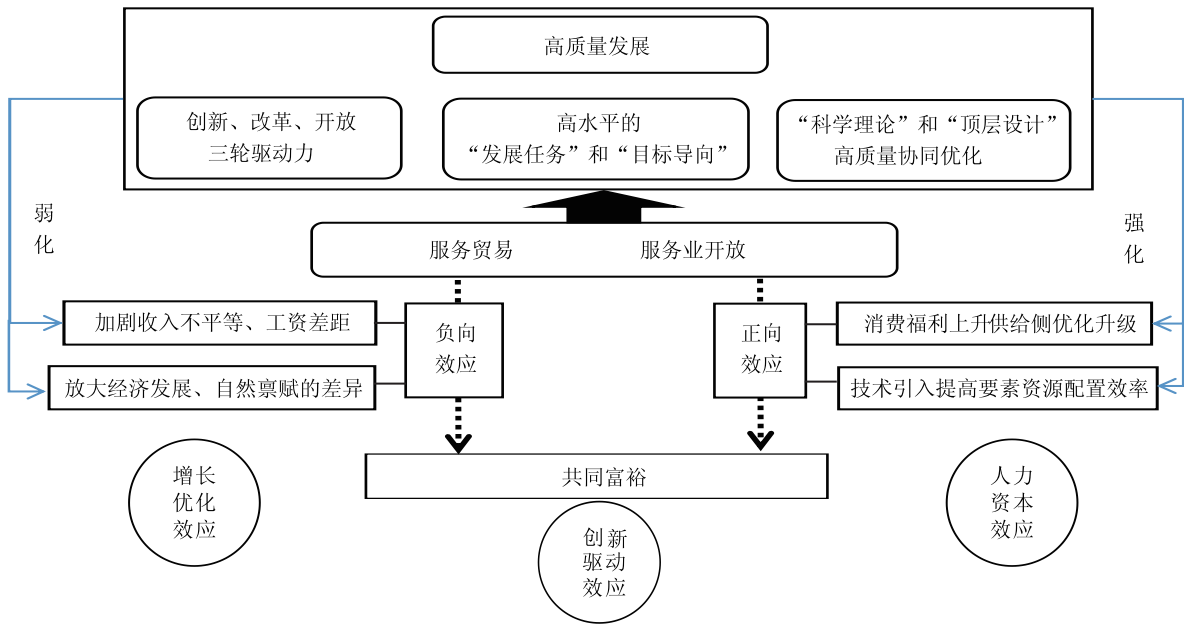


图1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影响逻辑和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综合相关资料经分析整理而得。

第三,人力资本效应,其展现为通过激发更深层次的服务消费需求,加快全社会不同类型服务行业的延伸扩张,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服务业对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促进效应,推动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层面共同富裕水平的切实提高。一是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是拓展社会就业空间、增加全新就业岗位的高效渠道。消费者服务需求的高端化、高品质和多样化,以及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形成新兴就业形式和岗位,推动人才高效流动、闲置劳动力广泛吸纳和有效匹配,实现全社会劳动者预期收入的有效保障和稳步提升,打造“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二是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服务产品供给的优化升级,实现对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满意度的切实提升。一方面,加快扩大教育、医疗等领域优质服务的供给规模和辐射范围,从教育和医疗等服务角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感,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水平。另一方面,依托我国博大精深、内涵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巩固和加强文化、旅游等领域高品质服务供给质量,使得人民群众能够放松身心、锻炼品格、开阔眼界和拓展思维,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方面共同提高劳动者个人价值与生产效率,丰富和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与品质素养,塑造我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人力资本蓄水池和培育仓。

二、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和主要特征

近年来,浙江省的服务贸易发展亮点纷呈、成绩斐然。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21年,浙江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规模突破5490亿元,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8.4%,规模居全国第四位,较2012年提升2.7个百分点,2012—2021年期间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速超过10.9%,服务外包、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示范区建设等均居全国领先地位。

(一) 服务贸易规模稳步扩大

随着浙江省营商环境优化,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离岸服务外包综合园区、在岸服务外包示范园区等产业聚集区域全面建设,2017—2021年,全省服务贸易规模从接近3663亿元增至5490亿元,年均增长约10.7%,总体规模增长速度和幅度相对较大。其中,服务贸易进口额从1234亿元增至接近2469亿元,出口额从2428亿元增至3021多亿元,进口和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分别突破18.9%和5.6%。^①

2021年,浙江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较2020年增长约28.1%。其中,进口和出口规模同比增长分别为25.3%和31.8%。与此同时,服务外包作为浙江服务贸易的重要途径和优势领域,以杭州、宁波两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重点,探索发展物联网服务外包、金融服务外包、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务外包等高端业态,为浙江服务贸易规模稳步扩大注入强大动力。2016—2021年,浙江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从556.08亿元上升到1109.65亿元,增幅接近1倍。其中,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合同接包执行金额分别从328.45亿元、50.68亿元和176.95亿元,增长到340.48亿元、211.51亿元和557.66亿元,增幅分别接近3.6%、317.3%和210.5%,成为浙江服务贸易高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②

^①数据来源:浙江省商务厅。

^②数据来源:浙江省商务厅。

（二）服务贸易长期总体顺差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两极化特征比较显著，2015—2019年，服务进口额占总贸易额的比例较出口额超出25个百分点以上。自2020年起，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呈现微弱收缩态势，但其规模仍接近1004亿美元。

相比之下，浙江省在近五年内却呈现出由逆差转顺差的主要趋势。自2011年以来，浙江省服务贸易总体呈现“出口大于进口”的顺差态势。尽管2018年和2019年分别有1676亿元和1559亿元的逆差，但在2020年后迅速恢复了顺差，且2021年，服务出口比进口多了10%以上。顺差额突破552亿元，同比增长2.8%。值得关注的是，顺差主要集中在运输、建筑、维护和维修服务、加工服务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产品上，上述四个领域2021年的顺差额分别超过244.9亿元、88.2亿元、38.5亿元和40.7亿元。除此之外，部分其他服务行业也逐渐呈现顺差态势，如保险、金融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等领域，2021年的顺差额分别为0.1亿元、94.9亿元和138.5亿元。

（三）服务贸易行业结构持续优化

2018年以来，随着浙江省扩大建设文化、人力资源、地理信息、中医药等特色服务出口基地、货物和服务贸易发展协调基地、离岸服务外包特色园区等，浙江省个人文化和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以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的贸易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的显著态势。同时，2018—2021年，浙江省运输和加工等传统服务贸易额稳步增长，分别从561亿元和59.9亿元，增至1718.9亿元和73.6亿元。^①

根据浙江省商务厅统计数据，2021年浙江省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以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领域的服务贸易总规模分别达到157.1亿元、134.2亿元、1433.5亿元，较2018年分别增长了1.8倍、1.1倍、1.8倍，年均增速分别超过了114%、29%、40%。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以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项目的出口规模分别超过了147亿元、31亿元、594亿元，占上述各项目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93.6%、23.1%、41.5%，较2018年的1.4亿元、3.8亿元、333.5亿元增幅超过104.1倍、7.2倍、1.7倍，年均增速分别达到371%、101%、21%。整体来看，浙江省服务贸易呈现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升，传统领域服务贸易优势强化稳固”的结构持续优化特征。

（四）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动能日益凸显

依托数字自贸区和数字人民币试点探索，商务数字化改革，以及分级分类开展数字生活新服务标杆建设，浙江服务贸易领域不断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产生的创新驱动势能日益凸显。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同服务贸易全链条各环节的深度结合，催生出服务贸易和服务业领域的新业务形态及新发展模式，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深刻赋能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贸易是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形式及主要模式。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浙江省相继启动了三批共67个省级产业集群跨境电商发展试点，涌现出全国最大的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以及一批以杭州全麦、杭州子不语、浙江执御、义乌潘朵、义乌吉茂等为代表的跨境电商领军企业。截至2021年，浙江省在主要第三方平台的出口活跃网店超过14.9万家，依托“跨境电商+原产地制造”等出海新模式累计培育跨境电商自主品牌1500多个，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

^①数据来源：浙江省商务厅。

达到 3302.9 亿元，约占全国的 1/6，较 2020 年增长约 30.7%。^① 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2021 年浙江省数字贸易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5279.0 亿元，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接近 1975.6 亿元，同比增长约 12.5%，其中数字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达到 1025.1 亿元和 950.47 亿元。^②

（五）服务业的开放合作不断延伸

我国主动参与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贸易协定，积极组织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一系列会展，充分发挥其促进投资和开放合作功能。

乘着深化对外开放和逐步建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东风，浙江省相继出台《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十四五”规划》《高质量建设全省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区的实施意见（2021—2025 年）》《浙江省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等文件，强调对标最高服务业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 and 标准体系，形成更加广阔、更为便捷、更大范围、更多优惠的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合作环境。同时，浙江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的突出优势，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中国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2021 浙江服务贸易云展会等活动，实现政府、商会和企业间的“云论坛”“云参展”“云对接”“云交易”“云签约”，有效减少传统跨境贸易成本，极大降低新冠疫情对国际经济合作的严峻冲击。当前，浙江省不仅长期保持与中国香港、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领域合作，还不断拓展与韩国、东盟十国等 RCEP 成员国，以及大洋洲、非洲国家（地区）的服务贸易合作，巩固、开拓和深化了浙江省服务贸易领域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三、浙江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

尽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并且取得较高水平和全方位的进展及突破，浙江省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开放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与复杂矛盾。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浙江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主要障碍。

（一）服务贸易省域内发展不均衡，地区间差异相对显著

浙江省服务贸易主要面临省内发展不均衡，省内各地区间存在显著差距的困境。在改革开放以来推行部分地区“先行先试”开放模式的长期影响下，浙江省部分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和开放条件具有地理、政策及经济方面的比较优势，直接导致浙江省内各地区之间的服务业水平和服务贸易发达程度的不均衡现象，省内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差距较为显著。杭州市和宁波市作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长期处于浙江省服务贸易领域的领头羊地位，2021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规模分别达到了 3314.3 亿和 1412.8 亿元，占据浙江省全省服务贸易总规模的 60.4% 和 25.7%，较 2020 年分别增长约 17.8% 和 69.4%。相比之下，温州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金华市、衢州市、舟山市、台州市和丽水市等 9 个市 2021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总计不到 763 亿元，仅分别为杭州市和宁波市的 23.0% 和

^①数据来源：浙江省商务厅。

^②张浩呈：《我省数字贸易指数实现跃升》，浙江工人日报网，2022 年 5 月 10 日，<http://www.zjgrrb.com/zjzgol/system/2022/05/10/033624288.shtml>。

54.0%，各市占全省服务贸易规模的份额均低于3%。在服务外包领域，浙江省各地区间的差距更加显著。2021年，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前10名的区县均隶属于杭州市和宁波市，前30名中隶属于杭州市和宁波市的区县占了20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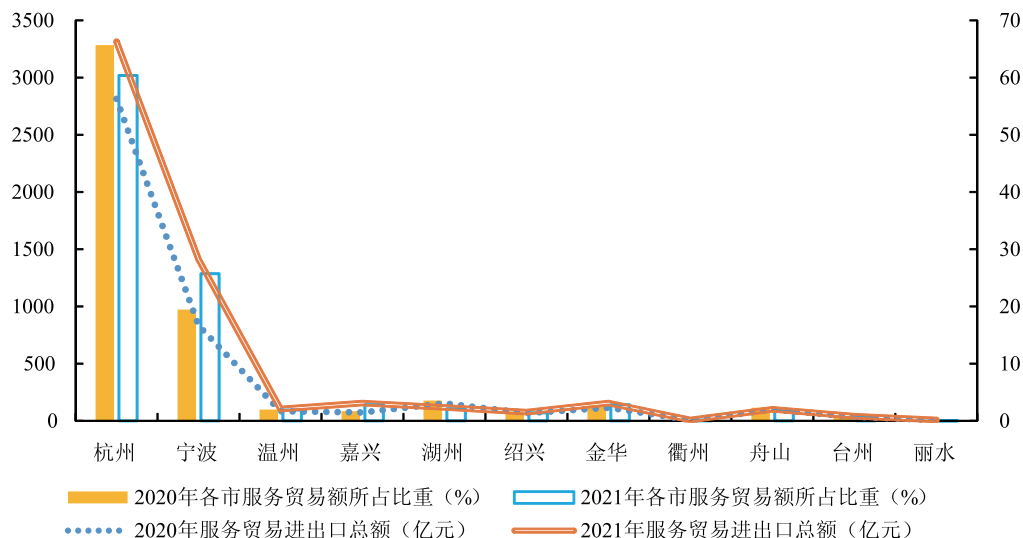


图2 2020—2021年浙江省各市服务贸易总额和所占比重（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浙江省商务厅，经作者分析整理而得。

（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逆差并未改变，国际竞争力提升潜力较大

虽然浙江省服务贸易整体呈现长期顺差的基本走向，但在不同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各有差异：在运输、建筑、加工服务等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保持着顺差态势；旅行、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服务领域则呈现逆差态势。

2018—2021年，旅游服务贸易一直呈现显著逆差，虽然出现持续收缩的走向，但截至2021年，出口和进口间仍有接近383亿元的差距，旅游服务出口占旅游服务贸易总额比重较旅游服务进口占比低16个百分点。此外，2018—2021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贸易领域长期处于逆差，在2021年达到约70.3亿元的逆差峰值。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由顺差转逆差”的发展态势明显，从2017年约有154.4亿元的贸易顺差规模，到2021年已经形成约243.6亿元的逆差规模。作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最重要的行业，知识产权使用费，以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反映了浙江省高附加值服务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空间和上升潜力较大。这同浙江省知识产权使用费，以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的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反映情况基本一致，即两者的TC指数长期保持为负，呈现出较明显的竞争劣势^①且远低于运输、建筑、加工服务等传统优势服务行业。从整体来看，浙江省的服务贸易竞争力也存在较大的提高空间。2021年，浙江省服务贸易的TC指数为0.10，尽管较2017—2019年间TC指数的数值略有好转，但全省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微弱的基本状况并未根本扭转。

^①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 $\frac{(\text{出口额} - \text{进口额})}{(\text{出口额} + \text{进口额})}$ 。根据浙江省商务厅的统计数据，2018—2021年，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贸易的TC指数分别为-0.88、-0.85、-0.64和-0.52；同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的TC指数分别为0.30、0.19、-0.09和-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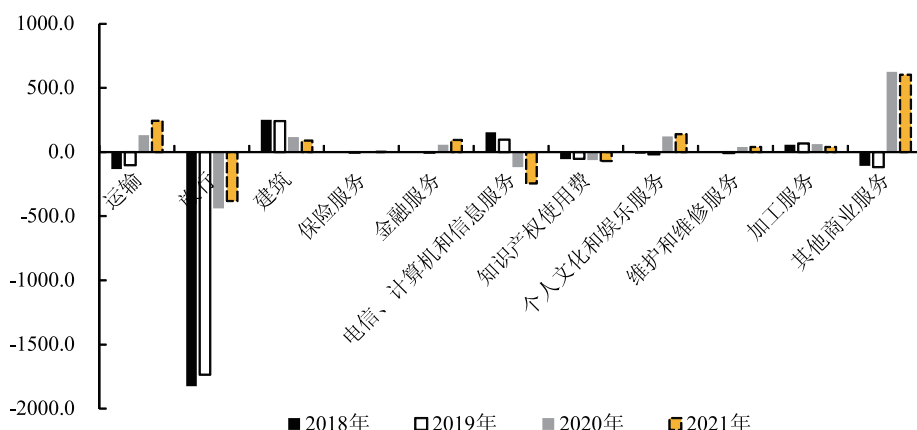


图 3 2018—2021 年浙江省 11 个领域服务贸易差额 (单位: 亿元)

资料来源: 浙江省商务厅, 经作者分析整理所得。

(三) 贸易顶层制度设计尚待完善, 政策扶持深度和精准度不足

2015 年以来, 浙江省陆续出台《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基地创建办法》《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十四五”规划》《2022 年商务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措施和规划方案, 基本确立了浙江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任务目标, 以及服务业营商环境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方向进一步优化的具体要求。为了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等 14 个部门联合印发《浙江省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政策意见》《关于金融助力外贸稳增长的若干意见》以及新修订的《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等文件, 浙江省内各地区也相继发布相关指导文件, 如《杭州市加快服务贸易发展资金扶持政策》《宁波市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等, 通过多元化渠道保障服务贸易的有序恢复、加速复苏和稳定发展。

然而, 有关地方部门协调和统筹规划仍然普遍面临实施口径不统一、管理缺位、贯彻落实不精准等现实矛盾。一是服务贸易相关政策扶持深度有待提升。专门扶持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部分财税支持政策审批前置条件过多、手续繁琐、申请时间成本过高, 成为政策扶持力度无法在具体领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重要因素。二是服务贸易有关政策扶持的精确度低。政府、企业间的“数据孤岛”、尚待疏通的信息数据传输梗阻现象、数字贸易统计标准和监测设施发展不足等现实问题, 导致数据共享、比照和实时共享面临巨大困难, 浙江省各地服务贸易统计数据遗漏、缺失和发布滞后等现象依旧存在, 极大影响浙江省服务贸易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

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建设的实施路径

依托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深刻赋能我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 实现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领域纵向与横向维度的充分拓展, 实现区域、城乡间更高效、合理的“均衡”发展, 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定位和关键发展方向。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发挥增长优化、创新驱动和人力资本效应, 强化服务贸易缩小区域、城乡间物质和精神财富层面发展差距的积极作用, 弱化甚至消除服务业对外开放可能导致的区域、城乡间发展不平衡, 以及服务业低端锁定等问题。

（一）坚持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优化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生态圈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例如，浙江省通过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加快省域内各地区服务业产业基础的强化和提升，缩小各地服务业发展差距，夯实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进一步优化全省的服务贸易产业生态圈。

一是积极培育培植强大、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一方面，依托跨境电商、数字会展等新业态和互联网、5G、云技术、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打造规模庞大的掌握自主品牌、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营销渠道的优秀先进企业，形成多层次市场主体竞相发展的新格局；另一方面，针对劳动就业和满足基本民生主要贡献者的中小微服务企业，政府要给予帮扶和特殊时期的纾困，通过改善企业投融资条件、提供劳动力培训、实施精准有效的税费优惠和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等，提升中小微服务企业市场竞争力，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和活力。二是加强浙江省服务业创新变革，积极促进全省各地服务业发展的数字化、智能化和高端化，牢牢把握数字时代的历史机遇，大力扶持服务业领域的全新业态，提高全省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减少低效高耗供给，为服务业现代化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三是推动浙江省服务业同各类产业，以及全社会生产链条各环节的有机融合，加强服务业发展和对外开放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深度。

（二）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精准定位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路径

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服务业领域的高质量、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当前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力军。因此，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较发达的产业基础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积极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把握好服务业开放的重点领域，高度重视开放相对落后的地区，进一步调整、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筑造更加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服务贸易领域国际合作环境。

坚持地方特色、合理地错位发展和精准定位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具体路径。以浙江省为例，在坚持全省发展一盘棋的前提下，着眼全省各地的服务贸易发展基础和特色优势，精准谋划不同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定位。充分运用杭州市数字贸易的引领地位，舟山市沿海资源的显著优势，以及丽水市生态城市的独特定位等，做大做强各地区相对优势服务行业的对外开放，形成各地合力以积极推动全省服务贸易的全面发展和数字贸易先行先试，切实维护好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势头，真正实现好各地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美好追求，深刻发挥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建设实践的赋能效应。

（三）重视强化数字化转型赋智赋能，加快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渗透融入服务贸易领域，数字化深度赋能服务贸易标的、工具和方式的创新变革，加快实现服务贸易的转型变革和优化升级。这一进程不仅推动了服务贸易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同时也为我国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这种动力对于加速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供需双侧的优化和匹配，全方位降低国际服务贸易的传统成本，扩大国际贸易的效益空间，以及催生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需深刻把握“数字化”的数字技术和应用的革命性突破，围绕数字化赋能浙江省对外开放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效应，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社会实现的有效路径。

一是以数字化加速国际服务贸易供需双侧的相互匹配和转型升级，发挥数字技术畅通服务贸易供需两侧信息数据的传输渠道，以及有效打破供需两端信息壁垒的作用，加快释放消费端巨大潜能，有效激发服务消费需求快速扩张和升级，形成最高效、最适配、最大效益生产要素组合。二是以数字化

减少国际服务贸易的传统成本，借助于服务贸易产品、工具和途径的数字化创新变革，能够有效降低服务贸易营销、谈判磋商、交付、运输等环节的成本支出，从“量”上有效扩大服务贸易主体的效益空间。三是以数字化催生服务贸易领域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在巩固运输、建筑、加工服务等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稳步扩大的同时，提高旅行、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推进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延伸，加快服务业要素资源的高效、精准和优化配置，缩短过剩落后产能淘汰的反应时间，从而全面提高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四）强化服务贸易赋能共同富裕理论研究，动态完善顶层制度和政策设计

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业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有效赋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伟大实践的题中之义。围绕这一重大议题所形成的中国学术体系为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赋能浙江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共同富裕建设，提供顶层设计和政策法规的参考依据和理论支撑。

目前，有关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如何赋能我国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一是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高质量”或“高水平”发展的概念框架和衡量标准，以及“高质量”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如何有效赋能均衡性、包容性增长，尚未形成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中国版本”理论构架和研究体系；二是如何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区域性试点经验基础上，提炼归纳出能够推广至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的政策建议和实施路径，也是亟待探索的重大课题。因此，应当加强高等院校、智库研究院、相关机构和政府部门间的合作研究，加强对上述领域的深入研究，并构建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政策工具，切实优化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开发领域相关政策落实的精度和深度，实现服务业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对共同富裕建设的高效赋能。

参考文献：

1. 戴枫、孙文远：《对外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基于亚洲和拉美国家的比较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2 年第 1 期。
2. 马颖、余官胜：《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10 年第 4 期。
3. 邵建春：《对外开放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基于国际收支视角的研究》，《经济经纬》，2012 年第 5 期。
4. 姚战琪：《我国服务业进口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学术论坛》，2022 年第 1 期。
5. 夏杰长、李奎洪：《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现实挑战与政策建议》，《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 年第 5 期。
6. 徐紫嫣、夏杰长：《服务业开放、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
7. 赵剑波、史丹、邓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 年第 11 期。
8. 裴长洪、刘洪愧：《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基于习近平百年大变局重要论断的思考》，《经济研究》，2020 年第 5 期。
9. 王鹏飞、夏杰长、王俊彦：《时间配置视角下的新人力资本理论：演进与展望》，《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22 年第 3 期。
10. 夏杰长、李奎洪：《数字化赋能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现实挑战和实施路径》，《国际贸易》，2023 年第 1 期。
11. 李彦军、宋舒雅：《“两山”转化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制与途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0 期。
12. 江小涓、靳景：《数字技术提升经济效率：服务分工、产业协同和数实孪生》，《管理世界》，2022 年第 12 期。

责任编辑：郭 霞

Security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promote synergy with China in the new era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n the next ten years,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hould be re-planned at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so as to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firmness of principles and the flexibility of strategie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ree Commons” principle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it will steadily and prudently carry out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promote new results in “small but beautiful” projects; strengthen the docking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gradually form a development paradigm that places equal emphasis on projects and rule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healthy, green and innovative Silk Road, continuously expand and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cooperation in new fields and new tracks, adhere to quality first, safety first, and high-quality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a stable and far-reaching manner.

(5) Thre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Xie Laihui

The “Belt and Road”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China’s all-round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a top-level design of economic diplomacy, and a practical platform for exploring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past decade,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carried out a lot of explorations and attempts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the disciplinary tradi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Belt and Road”.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path research on the theoriz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largely based on three perspectives: wealth, state power and social purpose. Although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elieves that wealth, state power, and social purpose are the three basic elements of the discipline, it emphas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is understand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future should break the isolation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achieve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compromise.

(6)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ogic

Huang Yutao, Ren L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so far, but it also faces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Promot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has important strategic value, but what kind of perspective to guid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has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rection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turn” in the frontier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mphasizing that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wa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path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focusing on specific experience. Different from the 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 generalization that directly summarizes abstractl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practical logic pays attention to the behavioral norms of soft constraints, the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ubject, and the direct experience of front-line participants. Guided by thi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emand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and feasibility,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park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enterprises,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should make use of their financial market advantag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 networks, and cooperate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hould adhere to the United Nations as the center,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customs and rules in a timely manner.

(7) Problems,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urasian Bridge Economic Corridor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Hou Shengdong, Wu Fan, Ma Qingbin

The New Eurasian Bridge Economic Corridor spans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nd connects the Pacific and Atlantic ocean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high-quality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recent years, remarkabl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urasian Bridge Economic Corridor,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conomic cooperation mechanisms, positive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RAILWAY Express, steady progress in land-sea combine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network, and obvious progress in mult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urasian Land Bridge Economic Corridor is still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increasing external uncertainties i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and the low level of soft connectivity such as rule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It is suggested that on the basis of promoting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corridor, optimiz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promoting the better integration of the corridor in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flow of key elements, more top-level planning and policy docking mechanisms should be explored,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level connectivity should be accele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should be promoted, and better integr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economic corridor cooperation.

(8) The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Take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Xia Jiechang, Wang Yueying, Li Luanhao

Service trade is the main field and key starting point of opening up, and Zhejiang Province is the forefront and important window for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building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in China, providing provincial cases and reference standard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on prosperity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role of service trad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on prosperity society, avoids the adverse effects of service

trade deepening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come disparity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fully gives full play to the three effects of service trad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zone, such as growth optimization, innovation drive, and human capital. At present, Zhejiang's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stages, but it is also facing many enabling dilemma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nabling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optimizing the enabling mechanism; adhere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ecosystem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deepen the opening up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accurately position the specific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continue to enh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mpowerment and acceler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empower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rade in services, and dynamically improve the top-level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9) The main “template” of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digital trade, the prospect of integration and China's response

Liu Hongkui, Lin Yufe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many countries, especially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continuously improved relevant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of digital trade have been upgraded to the leve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first to study and implement its digital trade opening concept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forming an “American-style template” represented by trade agreements such a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and the “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 However, the EU and Asia-Pacific countries have differenc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concept of digital trade openness, and thus formed the “European-style template” and “Asia-Pacific template”. On this basis, digital trade rules in major trade agreements continue to converge and develop. The common provisions of the above three digital trade “templates” in the four topics of trade facilitation, tariffs and digital taxes, cross-border data flow and cybersecurity,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have basically been agreed,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digital trade and the increase of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ulation of rules, the difficulty of reaching a consensus on international rules of digital trade will also increase. China's research on digital trade rules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the number of trade agreements signed containing digital trade provisions is also small, and there is a gap in the depth of the rules and provisions that have been included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digital trade in the future, so as to grasp the initiative of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10) Ideas, principles and paths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Lu Xinho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celerated adjust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ttern, China-Japan-South Korea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decoupling and chain breaking, and restrictions on high-tech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nd the long-term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ring continuous pressure to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eek new ideas and strategies for China-Japan-South Korea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y sorting out the curr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tern that has been formed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ing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ideas, principles and paths for promoting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should jointly maintain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take “industrial complementarity and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as the basic principle, promot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South Korea, strengthen strategic binding and entanglement of interests, prevent decoupling and chain breakage, break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cooperation mode thinking, cultivate and expand new cooperation growth points, and focus on promoting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semiconductors, automobiles, digital economy, green and low-carbon, healthy elderly care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deep nesting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dustrial chains,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Japanese and Korean industries in the high-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industries with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n the high-tech field, and promote China's industries to leap to the middle and high 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11) Research on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al power and wind and photovoltaics—Take the new coal-rich areas of Jin-Meng-Shaan-Xin as an example

Wang Chengren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actively and steadily promot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In the promotion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it should bas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oal-based resource endowment, coordin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ergy security, grasp the principle of “first establish before breaking”,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al power and new energy power. The four provinces and regions of Jin-Meng-Shaan-Xin are the main power supply areas in China, with abundant coal resources, coal power and new energy power “double high” characteristics, and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they face multiple difficulties such as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ensuring national power supply, and maintaining economic growth, and urgently needs to make good use of coal resources,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al power and new energy power, and explore the road of energy supply and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resource-rich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le of coal power from “main power supply” to “main power supply and service power supply”, improve the flexibility and adjustability of coal power,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wind, solar, fire and hydrogen storage”, innovate the business model of coal power and wind and photovoltaic integration,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guarantee for the positioning of the new role of coal power, solve the problems of cross-regional power consumption and factor guarantee, and explore a new path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m.

Editor: Yang Yuge